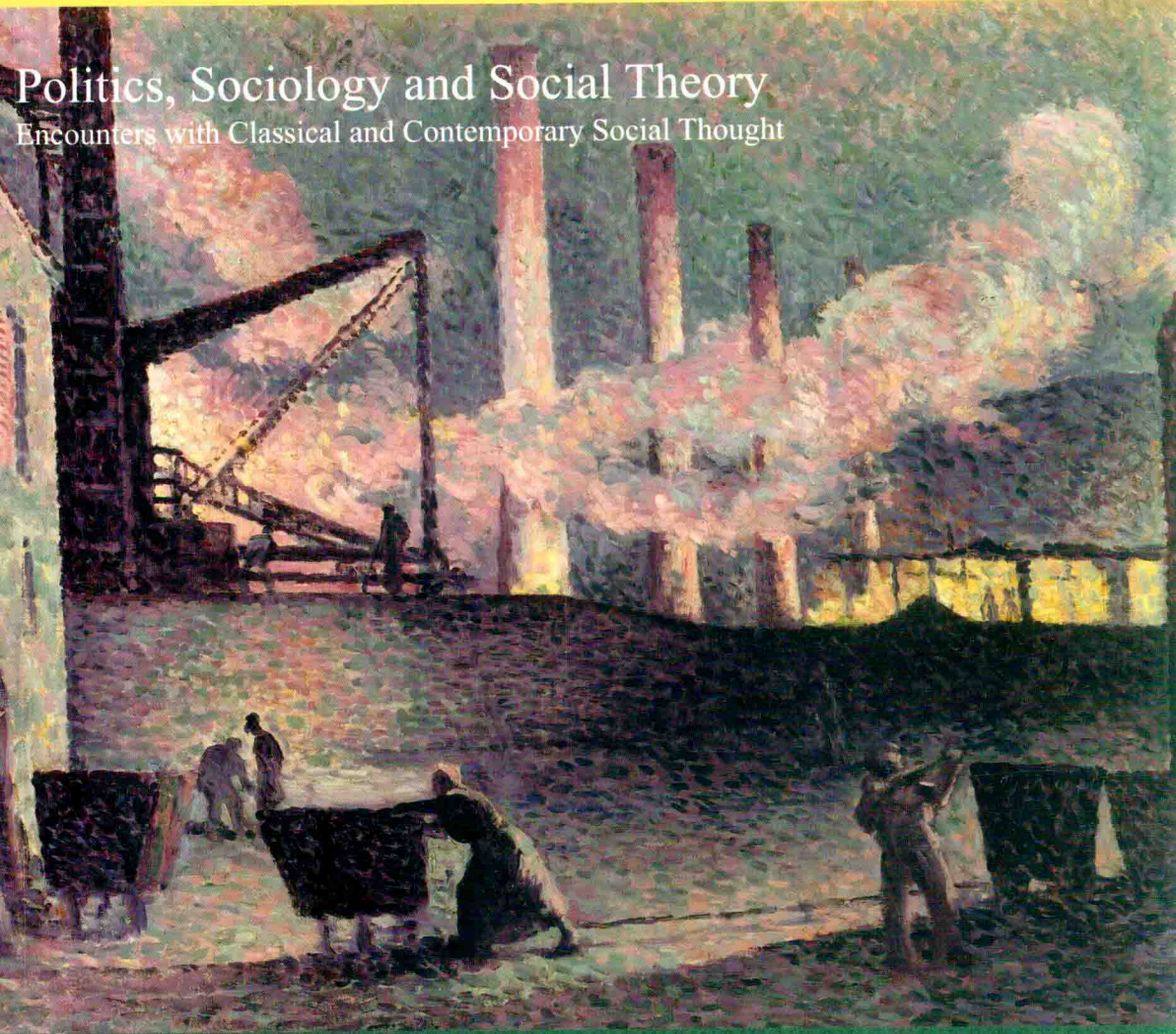


格致人文读本

Politic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Encounters with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ought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潮的碰撞

[英]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 著 何雪松 赵方杜 /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潮的碰撞

[英]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著 何雪松 赵方杜 译

20
447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潮的碰撞/(英)吉登斯(Giddens, A.)著;何雪松,赵方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格致人文读本)

ISBN 978-7-5432-2455-1

I. ①政… II. ①吉… ②何… ③赵… III. ①政治社会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9422号

责任编辑 顾悦
装帧设计 路静

格致人文读本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潮的碰撞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何雪松 赵方杜 译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07,000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455-1/C·116

定价:36.00元

· 格致人文读本 ·

主编 ↗ 陈恒 策划 ↗ 王秦伟

编辑的话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解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对“人文”的关注和反思，无论中外和古今，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话题。然而 20 世纪以来，人类往往因掌握了引领时代发展的科学技术而沾沾自喜，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同时，精神活动空间却日趋褊狭。反映在学科教育上，即教育趋向职业化、工具化，无法传递人文关怀、人性之美。耶鲁大学教授安东尼·T.科隆曼(Anthony T.Kronman)认为，人文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作品而去“探究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重提人文学科，再次发掘人文学科的魅力和价值，目的也就在于为久浸于科技文明喧嚣的读者，营造一方“解人文，思自我，通古今，知天下”的精神家园。

当今的人文学科，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文史哲的范畴，涵盖了艺术学、教育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各个专业。学者对人文学科旨趣、致思方向和思维方式的探讨，使得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更加宏大，研究对象愈发复杂，研究方法日趋多样。近年来人文科学的发展，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方便读者便捷、有效地了解古今中外杰出的研究成果，我们遴选了 20 世纪以来人文研究领域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经典著作，汇集为“格致人文读本”，其内容涵盖了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和各领域的具体研究，且每一种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

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专业教科书,兼具可读性和学术性。

“心理东西本自同,文明新旧总相宜。”我们希望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契机,为广大高等院校师生和爱好中西文化的社会大众,提供开拓视野的路径、思考与批判的平台、点染启迪心灵的气韵,进而在整个社会,尤其在高校中培育深厚的人文精神滋养。

前 言

本书收录的论文来自不同的出处。第一篇论文《马克斯·韦伯论政治学与社会学》，最初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余下的论文来自两本著作：《社会理论与政治理论研究》，最初由哈钦森出版社出版；《社会理论的议程与批评》，最初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从这两本著作之中选取论文遵从的主要标准是当代的相关性。我希望读者认同，这里重印的论文依然符合今日的旨趣。我对收录在本书中的论文有少许修订并删去了不必要的注释。然而，论文的实质性部分原封未动。

我要感谢帮助我准备出版这本著作的众多人士，特别向凯蒂·吉登斯(Katy Giddens)、唐·休伯特(Don Hubert)和妮古拉·罗斯(Nicola Ross)致以谢意。

Politic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1st Edition), by Anthony Giddens, ISBN:9780745615394

Copyright © Anthony Giddens 1995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olity Press Ltd.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Polity Press Ltd. and TRUTH & WISDOM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4 by Polity Press Ltd. and TRUTH & WISDOM PRES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9-2014-297

· 格致人文读本 ·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潮的碰撞》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何雪松 赵方杜/译

《苏格拉底之城——古典时代的雅典(第二版)》

[英]J.W.罗伯兹/著 陈恒 任荣 李月/译

《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二版)》

[美]伊恩·莫里斯 巴里·鲍威尔/著 陈恒 屈伯文 贾斐 苗倩/译

《罗马》

[美]M.罗斯托夫采夫/著 邹芝/译

《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

[美]布赖恩·莱瓦克 爱德华·缪尔 迈克尔·马斯 梅雷迪斯·威尔德曼/
著 陈恒 等/译

《全球文明史——人类自古至今的历程》

[美]坎迪斯·古切尔 琳达·沃尔顿/著 陈恒 等/译

《世界妇女史》(上卷)

[美]凯瑟琳·克莱 钱德里卡·保罗 克里斯蒂娜·塞内卡尔/著 乔昭印
张凯/译

《世界妇女史》(下卷)

[美]帕梅拉·麦克维/著 洪庆明 康凯/译

《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

[法]雅克·勒高夫/著 徐家玲/译

《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美]杰罗姆·凯根/著 王加丰 宋严萍/译

《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

[英]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著 龚萍 傅洁莹 阙怀未/译

目 录

前言 / 1

导论 / 1

第一章 马克斯·韦伯论政治学与社会学 / 11

第二章 马克思、韦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 42

第三章 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 / 61

第四章 涂尔干与个人主义问题 / 91

第五章 孔德、波普尔与实证主义 / 106

第六章 帕森斯论“权力” / 153

第七章 不可能的精神领袖：重读马尔库塞 / 166

第八章 加芬克尔、常人方法学与解释学 / 179

第九章 哈贝马斯论劳动与交往 / 189

第十章 福柯、尼采与马克思 / 199

译后记 / 207

导 论

本书旨在对经典社会理论和最近的思想流派中的一组议题予以一系列的整合性反思。在撰写本书前面的一组文章之时，对社会学“经典”的认识状态与今日大不相同。20年之前，“经典”并非其本来的面目。那时，英语世界的社会学为美国视角所宰制，尤其是理论这一块。议程是由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所设定的，该书最初出版于1937年，但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帕森斯致力寻求的是后世所谓的社会学“范式”，他汲取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思想家的智慧以完成这一任务。帕森斯的著作一开始就引起了广泛批评，至今仍是争辩的主题。

无论帕森斯的开拓性著作优劣如何，它都具有广泛的影响，进入大众视野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一代与众不同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建立了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创立了其他社会科学。在帕森斯看来，1890—1920年那一代人以一种明确有别于前辈的姿态提出了更具想象力的社会解释方式；这一代人为后续出现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确立了主要基调。

当然，帕森斯不单是引入这样的观念，他自己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帕森斯有助于形成这样一个观念：社会学有着立场不同的创立者。这一点在帕森斯的学生及同事墨顿那里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个层面：正是帕森斯，而非他人，通过这一著作将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之一介绍给了盎格鲁-萨克森的读者。他翻译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了《经济与社会》节选本的英文翻译版，并将韦伯著作的

社会学观念带入公众视野。

帕森斯对韦伯的解释是独特的，因为他希望充分利用韦伯以建立自己的体系。无论他人对“帕森斯式韦伯”持何种反对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帕森斯是帮助韦伯成为英语世界社会学独树一帜的人物的主要学者之一。尽管无论如何，这样的情况都会发生，但在帕森斯之前，韦伯在盎格鲁-萨克森的学者看来只是经济史学者和法学理论家。有例可证，例如托尼(Tawney)对韦伯的解读，后续弗兰克·奈特——以《一般经济史》为题出版的著作的翻译者，也是这样。

帕森斯对于将涂尔干引入英语世界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在韦伯的著作出版之前，涂尔干的若干著作已面世；再加上，涂尔干是社会学专业的倡导者，所以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对英美社会学与人类学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除了引入人类学——特别是拉德克里夫-布朗的人类学著作——之外，涂尔干的思想在盎格鲁-萨克森学者那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很多人认为涂尔干是形而上的集体意识的理论家——有些人甚至认为“集体”要高于“个体”。帕森斯对涂尔干的论述有诸多不足之处，但它有助于将涂尔干著作的批评性分析提升到一个新的抽象高度。

当我撰写自己的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后面的部分内容收入本书——之时，帕森斯的影响正在巅峰。有趣的是，当时很少有人会想到经典社会学的三圣将成为社会学本科课程的核心部分。《社会行动的结构》只有几页论及马克思，帕森斯只是将他视为 1890—1920 年这一代人的功利主义先驱。

很多学者试图以马克思去对抗帕森斯思想的单边倾向，诸如达伦多夫、约翰·雷克斯(John Rex)、洛克伍德(Lockwood)。然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与韦伯和涂尔干均没有关联，认为社会学思想的发展主要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再到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学派的主线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即便迟至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学有不同的创立者以及他们均出现在欧洲这一观念都没有被串联起来。当时英国的社会学有很强的经验倾向——受到费边主义和研究社会福利问题这一导向的主宰。马歇尔的著作也许是其中的引领性典范。社会学的理论思维为人类学思想所笼罩。社会学没有人可与人类学耀眼的群体媲美，除了布朗之外，诸如马林诺夫斯基、埃德蒙·利奇、雷蒙德·福思等等。还有一两个移民学者是例外，如曼海姆(他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相对容

易),本土的社会理论家难以进入同一个圈子。他们主要是从以前的英国思想家,例如斯宾塞和霍布豪斯,而不是欧洲大陆的思想家那里寻求灵感:莫里斯·金斯伯格的著作即为其例。

在美国,当时社会学家的主体将其先驱归于本土资源——诸如符号互动论和芝加哥学派等。在斯莫尔的影响下,齐美尔的著作或某些论文在美国比韦伯和涂尔干更广为人知,更不用说马克思了。不单是帕森斯的努力,而且具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学者,也改变了以前所强调的重点。汉斯·格特(Hans Gerth)、本迪克斯和科塞等学者批评帕森斯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然而,他们的集体影响强烈地重新定向了美国对欧洲社会学历史的阐释。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理论》中,我加入了内容全面的马克思的章节,关注程度与韦伯和涂尔干一致。我致力于质疑帕森斯 1890—1920 年是“突破性”一代的概念,以及他对韦伯和涂尔干的某些具体阐释。我也试图指出,马克思预期到了韦伯和涂尔干阐发的若干核心论题:马克思对韦伯的影响在帕森斯的叙说之中是以无声的形式呈现的,我想要阐明韦伯深刻地受益于马克思。“创立者三角”这一观念由此定形——这一现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也并没有特别想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三个主要社会学经典人物的地位。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争论——争论在于所有智识领域的解释,但社会学领域尤甚。除此之外,突然间,“三圣”不再是三个人了,因为看起来马克思主义要彻底销声匿迹。在很多人眼中,我们或多或少又回到了出发点,即帕森斯崭露头角时的那一刻。苏联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社会秩序模式的解体,意味着马克思不应该再享受与韦伯或涂尔干同等的地位。我将在后面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当代地位这一议题,但首先我要检视社会学经典总体地位的争辩。

对于我们而言,社会学的经典意味着什么?“经典社会理论”这一术语具有某种实实在在的力量,抑或是方便起见的含糊标签?经典与创立者是一样的吗?

首先我认为,每个智识领域,包括社会学,都有其自身的社会学历史——如果你乐意,可称之为建构的历史。因为存在某个阿基米德支点,一个学科才得以成立——这一观点是由其创立者催生的,但它经不起仔细推敲。因此帕森斯宣称,1890—1920 年这一代形成了“大分流”,并由此开始了社会学。换句话说,社

会学的历史可追溯到这一时期。这一观点至少是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它承认1890—1920年这一代建立了一门新的学科这一主张在表面上是具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社会思想演进的前期,就会发现思想家前赴后继地宣称自己开创了关于社会的、新的科学,而将先驱者弃之一旁。涂尔干对马克思如是说。然而,马克思坚信自己超越了孔德和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相信自己超越了前人;维科认为自己是社会的“新科学”的创立者(也许,在此处他真的是第一人)。

我认为,所有的智识领域都有自己普遍认同的创立者,在某些领域,创立者的著作被广泛认为是“经典”。所有的学科都有其创立者,这是学科起源的迷思的一部分。学科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不会分明如地图上国家之间的边界。每个公认的智慧学科都要经历一个自我合法化的过程,这一点与国家的形成不一样。所有的学科都有其虚构的历史,所有这些均是想象的共同体勾勒出过去的迷思,从而划定自己的内部发展和统一性,并区分自己与相邻学科之间的边界。

尽管国家并不一定遵循任何的自然特性,但国家的边界具有相当大的符号价值。它即刻成为忠诚与区隔的根源。这同样适用于智识学科,视乎其认同和教学课程的差异。甚至术语都有相似之处:国家有边界,学科有其“领地”;两者都将更大的领域划分为更小的区域,而这在有时候对整体的统一性是一种威胁。

形成智识领域的想象共同体的虚构历史——如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高度选择性。很明显,什么忝列其间,不仅仅是那些以某种仪式化的方式“体制化地记忆”和传承的,也有为了重构历史而忘记的。马克思、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等现在还在记取和阅读,但谁还会记得谢夫莱(Schäffle)、沃尔姆斯(Worms)和勒普莱(Le Play),遑论阅读?在回溯以往的过程中,创立者有其独特的地位,这至少部分地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它与这些人在其同辈之中如何被看待并不一致。

如国家的意识形态一样,看待过去伟人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人们会基于变动不居的事件、潮流和需要而进行阐释和再阐释。沃林争辩说,创立者的合法化“既有政治的维度,也是政治学”。创立更准确而言是“政治的理论化”,因为从创立者的著述之中衍生出的原则规定了智识活动的基本维度。有些观念在回溯性斗争之中占领先机,有些当然败下阵来。在此脉络下,政治行动或多或少意味

着各派势力对一个智识领域的合法秩序有着持续的角逐。智识传承的“政治”因某一垄断性观念得到公认而慢慢淡出视野：主导型预设从而成为不言而喻的观点和程序。

问题是：合理化的框架在何种程度上是暧昧不明的？若非历史进程以另外的方式展开，难道不是谢夫莱、沃尔姆斯和勒普莱的著作放置在我们的书架上，而非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人的书籍？它们是否应有一个“考验期”，从而具有某种半革命的价值？所有的智识领域都有创立者，但只有社会科学倾向于认同“经典大师”的存在。此处，我们将创立者的观念转变为经典大师的观念。在我看来，经典大师是与我们对话的创立者，而这样的声音具有相关性。他们不是陈年的断壁残垣，而是可以一再阅读，让我们受益以反思当下的问题和议题。

为什么这样的“经典”看法在社会科学中是一种特殊的动力，缘由诸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有着逻辑的鸿沟；在社会科学中没有自然科学所宣称的累进知识；第二，与之相关的是，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与它们致力于分析或阐明的研究主体有着不可避免的反思性接触——人类行动是历史建构的。

某种程度上，两个吊诡的结果随之而来。一方面，观点与发现在“吞并”和融入社会行动者的日常知识之中的时候就沦为常识，因此看起来过时或微不足道。另一方面，某些学者的著作的智慧是论及人类社会存在的长期面向。

沃林提到的“史诗理论大师”就是著作包含了这样的智慧的人。沃林认为，史诗理论大师不仅在回溯再现中获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以其行为获得地位。这样的行为是思想层面的英雄壮举：他们创造了有别于以往的观察事态的全新视角。因此，某些史诗理论大师经受住了“考验期”，仅仅是因为其成就与其前后的思想家相比卓然不群。毋庸置疑的是，“历史”的判断对此有一定的模糊性，也具有流动性特征。然而，史诗的地位是努力争取而不能是分配的结果。

假设有人被问道，为什么社会学家还在读韦伯而不是桑巴特？在桑巴特的时代，他在两个人之中可能更有名气，他的著作涉猎甚广。然而，桑巴特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泯灭无闻，而与韦伯的对话却持续至今。我认为，如果对桑巴特和韦伯的成就进行系统的比较，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桑巴特的被忘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暧昧不明。你也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可能的智识发展的世界：桑巴特在其间作为具有关联性的学者而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如果客观一点看，

你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韦伯是史诗理论大师，他超出了桑巴特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你将涂尔干与谢夫莱、沃尔姆斯、勒普莱或其他类似的著作已无人问津的学者相比较，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我最初论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人的时候，他们在思想史之中的适当地位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持平而论，社会学的历史就包含了这样的内容。意义的阐释、意向性和文化创造的历史特征等问题不仅在社会学文本之中进行了讨论，而且在分析这些文本自身的重要意义之时也要回应这样的议题。如何解读这样的现象已引发诸多迥异的立场。当然，不同的立场相应地体现了与这个议题相关的更为宽广的理论分歧。

此处我不会讨论如此纷呈的观点。一个尤其热议的视角是昆廷·斯金纳等人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历史主义者”既批评思想史的辉格版本，又批评在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影响下而采取的更为相对主义的立场。他们认为，思想史的写作应该基于对脉络的敏感性。例如，我们今天对“经典”的应用可能与最初在特定脉络下形成这一套观点的冲动差异甚大。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思想史，就需要准确把握“脉络”。这并非仅仅意味着要将观点或文本置于更为广阔的思想生产的框架之中。历史主义者说，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作者在写作之时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写作的文本的读者是谁，在他们的头脑之中试图回应什么样的问题或议题。作品需要根植于言辞之外行为的网络之中进行理解——这样的行为通常是实践性的或构成性的，也是纯粹智识性的。

罗伯特·琼斯争辩说，要理解涂尔干，就需要把握涂尔干写作这些文本的意图，这些文本体现了作者自己所认定的真实世界。“如果涂尔干没有——至少原则上如此——认定陈述即他正要说的或做的准确表述，他就不能被认为是有所企图的或已经做了点什么。”很容易看到，这种作者再生产的观点与解释学的基本面向是如此接近。基本原则与维特根斯坦所论述的大体相若，虽然与奥斯丁的有所不同。要认识行动主体的意图所在，就必须了解作者所知并应用于相关的行动之中。描述这样的行为，如果没有“准确”把握，就可能有犯错之虞。

历史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无论是斯金纳所提出的版本，抑或是更加社会学色彩的版本。例如，有论者指出，作者——这可能特别适用于“史诗理论大师”——实际上并没有仅仅将观点指向其活动的地方脉络。论者可能在写作之

时想到的是不确定的、未来的读者，而且认为自己处理的是非常普遍的议题，而这是整个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脉络”，这看起来是一种缩小或限定作品可以面对读者的方式，需要更加广阔地与文化的不同纬度进行再联结。

历史主义的主要观点并不因这样的观察而被推翻，尽管它因而失去了某些表面的定见(hardheadedness)。将作者的观点置于其脉络之中予以理解这一议题依然很重要；我认为，如果它在哲学层面是有效的，它就可为反对相对主义的调和论提供坚强的堡垒。

请看我在本书的开篇对韦伯和涂尔干的不同阐释。此处我讨论了韦伯和涂尔干形成社会学观点的社会政治脉络。这样的脉络本身就是有趣的，更为根本的是，它们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是什么引发了两位作者以这样的方式书写。当我们越是了解韦伯和涂尔干写作的脉络之时，我们就越能推导出他们的意图；推导出的意图相应地允许我们进一步厘清他们作品的脉络。

如此观察的意涵需要进一步澄清。要点在于，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文本的意义并没有最终的话语权，或者他们有但就此受到质疑。作者没有这样的特权。相反，议题转化为把握“作者”的所指。我们都是自己行动的作者，无论是否存在一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影响，或我们的活动是否会出现我们未曾预期的后果。

作为文本的作者与作为行动的执行者有着关联。福柯等人争辩说，作者即某种“话语性”特质的集合。但实际并非如此，写作，如同做事，意味着能动、反思性和更长时期的计划的意图之纠结。在思想史——与后期使用“经典”这一表述相反——之中，署名如同行动一般受到诘问，无论行动细微还是宏大，都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脉络之中进行诘问。在日常演讲和行动之中，我们并不允许个人对其所言或所行的意义拥有最终的控制权，但我们赋予演说者或行动主体澄清的特别优待。

当某人的所说或所行看起来难以理解的时候，或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想要提出异议的时候，我们寻求意向性的述说，我们也让受质疑者去特别审视这样的意向性。然而，我们也评估个人所言或所行的意向性层次的指导性主线，这是给予更宽泛的标准，而非个人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寻求将特定行动或行动序列整合进一个更为宽泛的人生史的阐释之中。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质疑之中所做的，与思想史的“诘问”或人生史的写作在逻辑上是类似的。为什么生活史只有充满